

烽火弦歌八十载 黔中“文剑”耀山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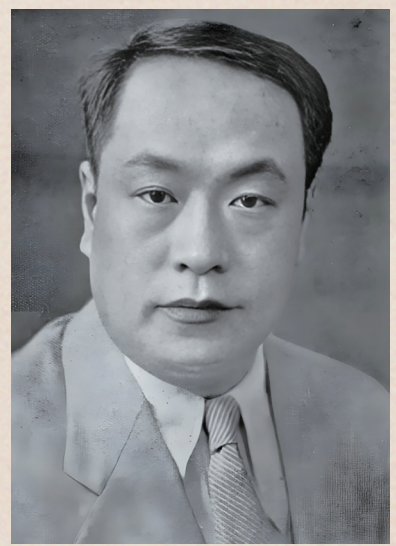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，在贵州这片热土上，涌现出黄齐生、谢六逸、蹇先艾、王启霖、胡秉铎等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教育文化界先贤。国难当头，他们以笔

为枪、以文为剑保卫家园。他们或倾力兴办教育，启迪民智；或奋笔办报创刊，传播真理；或组织救亡活动，奔走呼号；更以文艺为武器，开展抗日宣传，揭露侵略暴行，唤醒民众觉悟，凝聚抗战共识，鼓舞军民士气。他们的

呐喊与抗争，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生动写照，在贵州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自今日起，本报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，重温这些文化战士的感人事迹与不朽贡献，铭记历史，传承精神，启迪未来。

谢六逸：办报创刊助力全民抗战

谢六逸（1898年8月12日—1945年8月8日）贵州贵阳人。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教授，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。谢六逸与赵敏恒、程沧波、陈望道、杜绍文、舒宗侨为复旦新闻六君子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谢六逸随复旦大学迁重庆。1938年8月回贵阳，担任由上海迁贵阳的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、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和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、教授等职。



谢六逸

抗战期间，谢六逸接手的第一份刊物是《立报》副刊《言林》，《言林》主要面对的是青年及文化阶层，谢六逸秉承短小精悍的办报原则，倡导“五分钟能知天下事”。

他先后刊登了陈毅、何香凝、施复亮等撰写的文章，深受读者喜欢；知名学者曹聚仁经常为报纸投稿，他称谢六逸是做拼盘子的好手；巴金也撰文评论：“在《言林》里，大半是时代的呼声，而且是青年的呼声……我们读它们才不会忘记自己是什么时代的人。”

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他们将侵略铁蹄直指淞沪华东，上海文化界同仁义愤填膺积极声援抗

主张抗战反对投降

战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应民众的强烈要求，茅盾、胡愈之二人商议要创办一份新的刊物，报道前线中国军队浴血杀敌的新闻，捍卫和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高地，他们将这本新杂志取名《国民》。

谢六逸是新闻界的领军人物，又熟悉日本情况，胡愈之便推荐他担任总编辑，那时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创办进步刊物要冒很大的风险。谢六逸在民族大义面前仍然义无反顾地接下了《国民》的编辑工作。

《国民》创刊后，谢六逸热情邀请夏衍、艾思奇、姚雪垠、薛暮桥等知名学者和进步作家撰稿，积极宣传进步思想，主张抗战反对投降。为使刊物更加

接地气为普通劳苦大众喜闻乐见，他还专门开辟了读者信箱适时解答民众救亡、生活等方面的问题。

1936年11月，国民党当局以“危害民国”的罪名无端将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王造时等七位爱国民主人士投入监狱，史称“七君子事件”。为营救七君子，谢六逸在《国民》周刊第六期撰文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又是一次笔祸事件，强调他们发表的是抗日救亡言论，没有过分偏激的地方，要求当局将他们无罪释放。此后又连续跟踪报道，及时刊登七君子与敌斗争的消息，最终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得放人。



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谢六逸文集》。

回贵阳养病以文反抗强权

上海沦陷后，谢六逸与报同仁辗转先到香港，后随复旦大学西迁重庆。在重庆，他长期身兼数职日夜操劳，终使他难以支撑，不得已辞去大部分教职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贵阳养病。

回贵阳没多久，他又开始兼任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、贵州大学教授、文通书局总编辑等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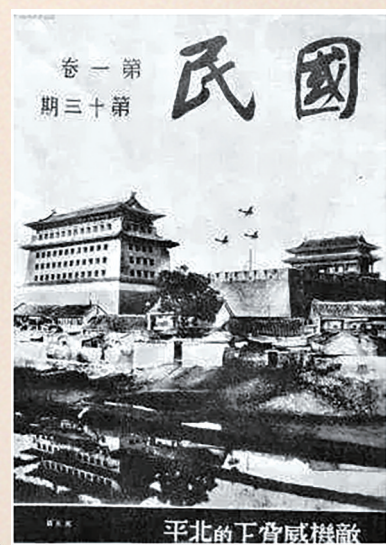
谢六逸在贵阳住了七年，也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七年。茅盾在《忆谢六逸兄》中曾写到谢六逸在贵阳的艰难生活：“他神情确有些憔悴，家累太重，他很忙。兼职有五六个之多，每天在马路奔跑的时间少说也有三个小时。”

茅盾最后一次与谢六逸见面也是在贵阳，老友重逢百感交集，他们庆幸劫后彼此还能够再次相会，随后又谈起了当下的时局，谢六逸说这里消息闭塞，他询问这场战事还将持续多久，茅盾回答应该不会太久，谢六逸沉吟片刻，操着贵阳口音坦率道：“两三年还可以，再长真有些吃不消。”

时任贵州省主席杨森是个大军阀，此人反复无常、独断专行。他曾下令锯掉所有靠背椅的椅背，有一年还下令全民穿短衣，并组织宪兵勇队在大街上巡逻，发现有穿长衫者就当场剪掉。谢六逸得知后极为愤怒，称这是欺压百姓

的天下奇闻，立即撰文反对。杨森看后气得暴跳如雷：“你有笔杆子，老子有枪杆子，咱们看谁厉害！”手下人连忙劝阻：谢六逸是有影响的人物，这样做得不偿失。杨森这才作罢。好友章锡琛对此十分感慨：平常只看到他态度安详沉默寡言，但到了愤怒填膺的时候，真有奋不顾身的气概。

1945年8月8日，在日本投降的一周前，谢六逸先生在贵阳市因病辞世，歿年47岁。



谢六逸任总编的《国民》期刊。

蹇先艾：用作品“唤醒民众”

蹇先艾（1906年9月12日—1994年10月26日），遵义老城人。笔名罗辉、赵休宁、陈艾利、蕙生等。中国现代作家。

1926年，蹇先艾加入文学研究会。此后，在《晨报副刊》《小说月报》和《文学》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。由于连续发表反映贵州民间疾苦的小说《水葬》《到家》等，被鲁迅誉为“乡土文学家”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蹇先艾由北平携眷返黔。



蹇先艾

团结作家抗敌御侮

1938年春，蹇先艾与谢六逸等人在贵阳发起组织了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”，他当选为理事。在分会成立大会上，他发表演说，认为“文艺作品……只要有内容的，有思想的，积极向上、反映现实的，都是最好的作品”。他主张作家不分什么新老，都要团结在抗敌御侮的旗帜下，共同将侵略者驱逐出境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成立之后，有力推动了贵州的抗日宣传活动。

1945年3月，蹇先艾创办了另一个文艺副刊，即《贵州日报》的《新垒》副刊。蹇先艾在《发刊词》中说，副刊发表的作品“取材依然以‘有关抗战’为主，但同时也选发其他方面的优秀作品”。在以后的工作中，蹇先艾努力实践了自己这一编辑理念。蹇先艾以辛勤的劳动，团结了省内外一大批作家，如茅盾、巴金、靳以、沈从文、臧克家、沙汀、艾芜、端木

蕨良、熊佛西、李广田、林辰等，都在《新垒》上发表过作品。蹇先艾在办刊过程中，还十分注意培养文学新人。他同许多青年作家交朋友，对他们寄来的不够刊发水平的作品，总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指出他们的不足，帮助他们修改发表，从而调动了广大青年作者的创作热情。

当然，作为作家，写作是最根本的。蹇先艾在这一阶段除了参加社交活动，主编文艺副刊，担任贵阳高中、贵州遵义师范学院校外，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。期间，他出版了散文集《离散集》、论文集《乡谈集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幸福》《盐的故事》以及中篇小说《古城儿女》，他还翻译出版了《美国短篇小说集》。应当说，这一时期是蹇先艾文艺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。

利用文艺进行抗战宣传

1936年7月1日，蹇先艾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在鲁迅等人发起的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》上签名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。他决心与所有的爱国作家一起，“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早已开始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”，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反帝爱国的道路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31岁的蹇先艾辗转回到久别的家乡贵州。1938年春，他同谢六逸、刘薰宇、张梦麟、李青崖、齐同（高滔）等现代文学家、作家一起，创建了“每周文艺社”，在《贵州晨报》上辟出《每周文艺》副刊，每期发表五六千字的文艺作品；还展开过一次抗敌戏剧

的讨论，赢得了不少读者，将唤醒民众、拯救民族于危亡的精神，播向山城，播向贵州的山山水水。《每周文艺》共出了51期。1939年2月4日，日本飞机轰炸贵阳，《贵州晨报》社被炸毁为废墟，《每周文艺》也就只好停刊。

《每周文艺》社解散之后，蹇先艾却没有忘记利用文艺进行抗战宣传。他数次深入农村，参加群众集会、火炬游行，提倡漫画和街头剧。他鼓励通俗文艺创作，号召作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为抗战服务，为民众服务。他呼吁“文章下乡”，认为农村宣传最好是用漫画代替标语，用歌曲代替口号，大力提倡在农村演街头剧等。



蹇先艾代表作《水葬》。

撰写文章 为作家请命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蹇先艾投身于争取民主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独裁统治的正义斗争之中。他主持的《新垒》上，陆续刊登了一些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作品。他还亲自撰写文章，为作家请命，主张“要用文艺配合民主政治的争取”。他还在《新垒》上刊登介绍评论苏联十月革命的报告文学作品《震撼世界的十月》的书评。

在他担任中文系教授的国立贵州大学里，他参加了“教授会”，同矿冶系教授丁道衡先生，中文系教授田君亮先生、陈述元先生等进步人士一道，积极支持学生争取民主、反对饥饿、反对独裁的斗争。蹇先艾还在广大教师、教授共同发起的《反饥饿宣言》上签名，并主动担任联络教授们同敌人斗争的联络员。



蹇先艾故居。